

清华园里的

人生

咏叹调

李昕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清华园里的

人生

咏叹调

李昕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李昕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10

ISBN 978-7-5426-5338-3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1568 号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著 者 / 李 昕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王笑红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5 千字

印 张 / 8.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338-3/I · 1072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序

这是一本出版人的手记，篇幅不大，十多篇文章，十多万字的容量，但读完之后却感觉厚重，因为它尽管写的是与书和书业相关的人事，思考的却是人的命运问题。

书中的事，大多与作者的职业——书业——相关，自己的成长经历，工作经历和感悟，点点滴滴在文中自然平实地流露。其中《〈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故事》则可以看作是一篇经典的编辑策划教案，过去虽听作者谈起过，但全程展示，仍觉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教益匪浅，尽管个中还有一些细节不便透露。

书中的人，大多是知识界耳熟能详、响当当的而且是充满个性的人物，其中写韦君宜的那篇，让人尤觉印象深刻。如果说，在书中，曾彦修的经历和品格，让人在崇敬之外多一份敢作敢为、一贯到底的畅快淋漓的话，韦老太作为“勇士与智者”的形象，则是在隐隐约约的柔性曲曲折折中，伴随着作者不断反思的过程逐步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回忆韦君宜，作者似乎想要告诉我们，要理解中国现当代智识分子的“本色”并非易事，因为其中包裹的东西，费人猜解的“谜”一样的东西，实在太多；在中国，刚性

的曾彦修式的事例恐怕并非常态，更多更普遍的是无数的“韦老太”。而真正试图解开这层层包裹的“谜”的尝试，则体现在书中的那篇长文《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里。

这是书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文章，不仅因其篇幅，也不仅因其传主的特殊性——作者的父亲，而是因为传主一生的经历所具有的典型性，而这种典型性通过作者毫不隐讳的表述得以完整体现。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很高智识水准且始终抱有进步理念，追求光明的读书人，在那个时代，绝非稀罕的物种，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在这些人身上的，既保有原先士大夫阶层的某些传统理念，也增添了不少朦胧的所谓新世界新时代的观念。于是，在他们以为的新时代来临之际，他们以其全部的热情、才智、精力投入到这个新时代中，以期为实现那个时代的宏大理想而奋斗。然而，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理想并非他们所认识所想象的，因此，尽管他们拼命地努力，甚至放弃自我选择的权利，却逐渐发觉自己越来越与环境格格不入，动辄得咎，结果是或早或晚因其持守的人格而遭到贬斥和放逐。待到一切回复常态，有机会重新选择时，则发现自己的黄金岁月已然逝去。作者在这里写的不仅是某个个人及其家庭的悲剧，而是一代智识分子的悲剧，为那泥沙俱下的所谓时代潮流裹挟而去的人生的悲剧。他们的悲剧似乎不仅在于其高洁的人格为时代所不容，而且还在于他们自主真诚地将自己所有的人生价值与某种宏大叙事式的理想捆绑在了一起。

尤为可贵的是，传主虽是作者的父亲，但作者叙述平实、真诚而直率，没有掩饰，没有为尊者讳。事实上，这既是全书的书写风格，也是作者一贯的为人风格。

李昕先生是我敬佩的业界前辈，也是心目中的老大哥。

与李昕先生相识，最初是因为工作关系。

京、港、沪三家三联书店虽同根同源，但分别是独立的机构，分属不同的媒体集团。随着原来的一些老人逐渐退休，三家三联，尤其是沪三联与京、港三联的往来，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稀疏，交流也少。樊希安先生出任京三联总经理后，力主加强三家三联的合作和交流，戮力打造大三联品牌，得到港、沪两地的积极响应，建立了每年合作研讨的机制，三家出版社的经营团队于是有机会相识、相知。

第一次见李昕先生，感觉是不太容易接近。李昕先生高而瘦，目光灼灼；讲话时声音洪亮，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加之个人观点鲜明，表达直率，很有震慑力。这与樊希安先生热情奔放，举止随意的风格适成对照。所以，初次见面之后，我与我们的陈启甸总经理都有这样的感觉，对李昕先生敬的成分远多于亲的成分。

但不久之后，我发现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觉，其实，李昕先生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

记得相识不久之后的一次聚会上，李昕先生对我讲，这几年你们的书出得很好啊。当时我以为他是出于客气和礼貌，意在鼓励，连忙表示与京三联老大哥相比，我们那些书不值一提。谁知

李先生正色地说，你们这几年出了好多种有思想、有影响、贴近现实的好书，怎么能说不值得一提呢；相反，我倒是觉得这些年京三联的产品过于孤芳自赏，囿于小圈子的格调了。韬奋先生教诲，出版要“力谋社会改造”的。在这点上，你们还真值得我们学习呢。当时我刚开始全面负责出版社的选题、编辑工作，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有些棱角的作品，心里其实也不完全有底，李昕先生的一席话，顿时令我踏实了许多。而且，我也强烈地感觉到京三联的出版风格在短期内也会有所突破。果然，一段时间之后，一批富有思想性的贴近现实的力作持续不断地推出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时代》。

由于两家三联分处京沪，平时彼此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因此难得一聚时，我们总要找机会与京三联的几位老总喝上一杯薄酒，一来交流信息，二来叙叙友情。李昕先生虽不轻易喝酒，但酒量酒品都很好，一般我们请他，他总是欣然前来。而且，他有一个习惯。他戒烟多年，平时一根烟都不抽，但如果酒喝得酣畅了，也会抽上几支。这个习惯我也有，我也戒烟好几年了。于是，跟李昕先生吃饭时，当酒喝到一定程度话也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老哥哥，抽一口？他往往是欣然同意，于是我照例是跑到陈启甸先生那里，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两支，于是乎沉醉在这酒后的一阵快活赛神仙的烟雾中。

虽则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我总自觉与李昕先生的友情并不浅。而且，这似乎是与许多三联人交往时都有的感觉。而且，三

联人似乎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某种特质,很难说清楚这是种怎样的特质,它更像是一种气息,由某种共同的氛围或其他什么所熏染出来的气息,无论在京三联还是港三联的同事身上我都会直感到这种气息,它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虽彼此见面次数有限,但我时常会在偶然中想起他们,想念他们。似乎是蓝真先生曾经讲过,一入三联门,一辈子就是三联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今年年初到北京开订货会,找机会与几位老朋友相聚。席间听闻李昕先生近来写了不少文章,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将陆续在李济平先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港三联原总经理)主持的《橙新闻》网站上作为专栏发表,日后也有结集出版的打算,我当即提出请交由我们出版,李昕先生慨然允诺,并说这真是大好的事情。

5月初,李昕先生将所有文章打包发给我,同时提出要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对此,我多次向李昕先生表示,由我来写序是不合适的,因为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无论在资历还是学养上,我都是不够格的。但是,李昕先生始终坚持,他说,我认为你最有资格写这篇序,因为你了解我这个人,而且,你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最熟悉这本书,我一向认为对于书责任编辑最有发言权。

我明白,李昕先生这样坚持,不光是对我的看重,更是对编辑这个职业的尊重。他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职业。

黄 韬

2015年8月8日

目 录

序	1
三访周有光老人	1
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	13
《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故事	37
本色韦君宜	66
我帮钱锺书打《围城》官司	88
遥望南天悼蓝公	109
曾彦修：自问平生未整人	118
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132
田家青：玩家与写作	152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162
我的红卫兵梦	246
后记	262

三访周有光老人

周有光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北京和香港两家三联书店都出版过他的多种著作。我本人和老先生曾在很多会议和各种活动中见过面，也曾有过电话联系，说起来甚至还算有一点渊源：20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曾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家在相邻的两座楼里，窗户正好面对面。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到他家里拜访过，第一次造访，已经是老人家106岁以后的事。

那是2012年1月21日。当时三联书店的编辑室主任郑勇约我一起去看望周有光先生。

早知道周老博学，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满腹经纶，被他的连襟沈从文先生戏称为“周百科”。也知道他越老越清醒，越老思维越敏捷，大彻大悟，智慧堪比神仙。但若不是亲历亲见，终究不过是坊间传闻。

老人的家极其简朴，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周都是书架。靠窗摆一张小书桌，对面是两个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张小茶几。老人让我们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在书桌后面对我们。我想起老人曾在回忆文章中写过，他夫人张允和先生健在时，他们每天就是



周有光先生

坐在这对沙发上饮茶饮咖啡，几十年如一日，“举杯齐眉，相敬如宾”。现在夫人离去了，家里的陈设一切未变。

老人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和我们谈天，随兴所至，海阔天空。我发现他除了听力差一些以外，思维反应之敏锐，简直和中青年学者无异，真令人称奇。将近两小时，老人滔滔不绝，主要是他讲往事。因为我们来自三联，话题自然是从三联讲起。他讲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与周恩来的接触，与黄炎培、邹韬奋的关系，交往可谓密切。他说邹韬奋和王志莘都做过黄炎培的秘书，而他做过王志莘的秘书（王志莘新中国成立前做过黄炎培开办的新华银行的负责人，解放后任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经理）等等。我知道黄炎培先生当年是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的资助人，这样说来，我忽然发现，原来周老也该算是一位三联的老前辈呢。他也谈到自己的身世，颇多感慨，特别是庆幸自己1955年转行搞语言文字，因而能在1957年躲过一劫。因为如果继续做经济学家，他可不敢保证“反右”时不说错话。聊了一会儿，我想起应该请他在三联八十年店庆时写几句话，寄语三联。老人听了，连连点头说好。我小心翼翼地问，“什么时间写？”没想到他说，“现在就可以写呀”。令我喜出望外。

我去拜访前，因担心周老听力不好，预先准备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两句春节问候语。此时这卡片在他手里。老人不假思索，拿起红色原珠笔，在卡片上写下“历久弥新”四个字，说，“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三联？”细想一下，这四个字真是颇具深意，既是对过往的评价，又是对未来的期许和要求。我和郑勇当时为之一惊，暗暗佩服老人的神思敏捷。后来，在三联八十年店庆前夕，我们专门派人去请老人题词，他题写的也正是这四个字。

给您拜年，
祝您身体健康。

三联的同事们
问候您。

历久弥新

周老为三联题写的“历久弥新”四字

老人百岁高龄仍然爱读书，而且对国际形势特别关心，我提到金雁刚出版的《从东欧到新欧洲》和曾彦修自印本《天堂往事略》，他竟然说都已读过了。我们聊天谈到美国可能要和伊朗开战。让人惊异的是，他转过身拿出一本 2011 年第 10 期的《炎黄春秋》，给我们介绍他新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走进全球化”。他说：“全球化时代，很多问题弄不懂了。我耳聋眼花，了解的信息更少。但是现在可以上网，国外也有些朋友给我寄材料，我还能知道一些东西。比如北约打利比亚，我搞不懂，他们哪来的权利？我上网一查，原来联合国 2005 年有一个决议，内容是讲，在国际规则中，人权高于主权。如果一国的独裁者屠杀自己的国民，别国有权以武力介入干涉。”他这样一说，我和郑勇顿感震惊。原来在国际协议里面，人权保护是一种共识。我们天天讲不干涉别国内政，这当然是一般准则，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国际关系和某些特殊国际问题。这样的事情，竟是百岁老人首先知晓，真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汗颜。

老人一打开话匣子，故事就很多。他讲到宣统皇帝溥仪的两个小笑话：

一是困难时期，凭粮票吃饭，粮票不够用，大家吃不饱。当时政府对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人员还是照顾的，在政协食堂吃饭不收粮票。所以有人建议他和夫人到政协食堂蹭饭，把粮票省给家人和保姆。他们去了一次，坐在食堂里，发现邻桌坐着的竟然是溥仪夫妇。原来皇帝也缺粮票！

另一个故事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溥仪的家，溥仪开了门，迎面挡住来人，问，“你们找谁？”红卫兵说：“找宣统皇帝。”溥仪说：“宣统皇帝早死了。”其中有一个红卫兵认识他，说：“胡说，你就是宣统皇帝。”溥仪答道：“我叫溥仪，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红卫兵顿时愣了，硬是没敢进门。我们听得哈哈大笑。

告辞时，我对周老说，“您这些故事都应该写出来，留给我们这些晚辈，这是一笔财富”。周老说，“我现在写文章很慢，很吃力”。我说：“没关系，您讲故事就行了，我们找人给您整理。”周老愉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约请了青年作家张建安为周老整理口述；一年以后，周老的《百岁忆往》在三联书店出版。

第二次拜访时隔一年，是在2013年2月7日。那一天是三联编辑罗少强陪我前往，周老的公子周晓平在座。还是那书房，那书桌，那小沙发，我们对面而坐。周老还是一样地满面红光，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笑风生。

话题还是从三联谈起。老人说，三联从来都是与众不同的出版社，对促进文化进步贡献很大。三联是邹韬奋创办的，他说自己和邹韬奋很熟，也算是同学呢。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韬奋比他高一年级，但是读书期间同学常常聚会，也常在一起办沙龙，周末还一起跳舞。老人说那时就看出邹韬奋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有主见，有思想。韬奋家境贫寒，他上学的费用，曾得到过周老的夫人张允和家人的资助。后来，韬奋开办生活书店，很长时间里他

和韬奋一直有联系。这是他和三联早期的缘分。

此时，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刚刚在三联书店出版，我们带去一本送给周老。周老当着我们的面，一边翻看书中的照片，一边说，“邓小平很了不起！”他解释说，1989年以后海外对邓小平的评价变了。但他认为，邓小平在改造中国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说，在他心目中，近代以来中国三个最重要的伟人是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老人抚摸着《邓小平时代》，说会好好地读这本书。这时周晓平插话说，老人读书很快，这样的书，读完也就需要一两天。我心想，这可是六七十万字的大书呢。

老人又谈了《炎黄春秋》的一些情况，他是编委，很关注这个杂志。他说2013年第2期里有几篇文章很重要，讲到有一篇文章谈朝鲜志愿军战俘遭遇，涉及一些统计数字，比如战俘只有少数人回国，多数人去了台湾的情况；又谈到另外一篇文章涉及我党延安时期的一些隐秘内情。他说这些情况过去他都不知道，人老了，也要学习，补充新的知识。他爱看这些讲真相的文章。我问他，《炎黄春秋》的编委会他还去参加吗。他说前两年是参加的，但是耳朵不好，大家发言他听不清楚，去了也只是和李锐等老人聊几句天，在会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后来就不去了。我问老人，近来可有什么新作？老人顺手从文件夹里拿出一篇短文给我看。这篇文章题为“圣人出，清河黄”，只有三四百字，主题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说，“圣人出，黄河清”，这是一句古

语，其实是反话。事实是，“圣人出，清河黄”，从“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人开始，他们一出世，就领导群氓开辟山林，刀耕火种，经过几千年，森林变良田，而清河也变成了黄河。黄河原本是清河嘛。老人还讲起“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代，他乘夜车从北京去上海，看到铁路两边火光冲天，千里通明。当时烧掉树木炼钢，引起了后来的滥砍盗伐，以致黄河和长江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殆尽，黄河更黄，而长江也黄河化了。“我们今天要吸取教训呀。”老人说得十分感慨。

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去看望杨绛老先生，问到有什么新作时，老人也拿出一篇仅三百字的短文给我，那文章题为“俭为共德”，文中有云：“近偶阅清王应奎撰《柳南随笔·续笔》，有《俭为共德》一文。有感于当世奢侈成风，昔日‘老生常谈’今则为新鲜论调矣。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讥，摘录《俭为共德》之说，以飨世之有同感者。”这篇短文后来发表在《文汇报》上，适逢当年的两会，一时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后来中央出台了有关廉政的“八项规定”，不知是否与杨绛先生此文有关。我想，这两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仍然关注着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把自己深邃的感悟和超卓的智慧贡献给社会，这是多么令人钦敬啊。

我拿着短文，对周老说，“这篇文章我要收藏，请您签个字吧”。老人提笔在那张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说，这些文章都该发表，老人说会的。他说近来写了不少这